

後全球化時代與新經濟生活

孫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南都觀察家，本文係在南都觀察和思想潮舉辦的觀潮沙龍“後疫情時代，如何重啟經濟生活”中的發言，20200620

在歌舞昇平的時候，這些矛盾會被掩蓋、會緩和。用中國特色的話說叫發展中的問題，用發展來解決。但是當發展停滯，甚至因為重大的衝擊而有所倒退的時候，所有這些矛盾，包括族裔矛盾、代際矛盾、貧富矛盾都會顯現出來，維穩成本也會急劇擴大，而整個社會都將在動盪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

當前的北京，“外頭的人進不去，裏邊的人也出不來”，正好體現了這次“大流行”以來的一個新常態——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卡在什麼地方。

今年 1 月下旬，我啟程去斯坦福大學，開啟訪問學者的第二個學期，正好趕上中國和美國的疫情相繼爆發。“國家不幸詩家幸”，對我們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這麼一個全人類共同遭遇不幸的時期，也是研究當下這個時代的最好窗口。南都觀察約我寫了一系列疫情觀察的文章，一開始我只是想分享和記錄一下生活，後來我寫著寫著，發現許多更深層次的矛盾也在疫情中被激化了。

舉個例子，上圖這個人叫洛莉·萊特福特（Lori Lightfoot），個子非常矮，是一個黑人、女性、同性戀者，也是芝加哥這座大城市史上的第一個黑人女性市長。2 月份的時候，我到芝加哥大學聽她的演講，她當時最關注的就是少數族裔的貧困問題——當然最主要是黑人。

當時，我們社交網絡上聊得最多的是華人華裔受到了歧視，比如當時川普說了“Chinese Virus”，大家都認為華裔受到歧視，但實際情況是華裔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總體上都高於美國的平均水平，這次疫情受到的衝擊也比其他族裔更小一些。

在疫情觀察的第三篇，我提到過在這次大流行裏面，美國受傷害最深的族裔肯定不是華人，而是非裔美國人，也就是黑人。我當時寫的時候是 4 月份，誰都不會想到，到 5 月 25 號的時候，喬治·弗洛伊德會被白人警官虐殺，所以現在鋪天蓋地都能看到“I can't breathe”，或者“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已經席捲全球，成為一個反種族歧視運動的口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事件當然是一個導火索，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少數族裔、弱勢群體一直以來受到的歧視和弱勢地位。在歌舞昇平的時候，這些矛盾會被掩蓋、會緩和。用中國特色的話說叫發展中的問題，用發展來解決。但是當發展停滯，甚至因為重大的衝擊而有所倒退的時候，所有這些矛盾，包括族裔矛盾、代際矛盾、貧富矛盾都會顯現出來，維穩成本也會急劇擴大，而整個社會都將在動盪中尋找一個新的平衡。

今天我簡單聊三個方面，一是疫情體驗和社會撕裂，二是政治形勢和經濟脫鉤，三是後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生活。

■ 疫情體驗和社會撕裂

首先，我想這次的全球“大流行”對於大部分人而言，都是一個永生難忘的回憶。我 1 月份到美國時，只有海關大廳有一點點信息，要求直接來自武漢且有症狀的旅客立刻與醫生聯繫，措施約等於零。整個美國社會，除了斯坦福我們這些所裏搞國際關係的專家對中國的疫情有較深瞭解之外，其他的包括普通知識分子，基本上一無所知。而當時在美國的整個華人群體，經我觀察，只幹了兩件事，一個是不計代價地往國內捐助醫療物資，還有就是在微信群以及其他各種社交媒體上打口水仗，我全面地參與或者說觀察了這兩件事。

第一件事讓我感覺到民族主義的威力遠遠超過了理性範疇。因為像是跟中國大陸有密切聯繫的，但是其他一些早已融入美國的華裔第二代、第三代，同樣也對中國人民充滿了同情心和同理心。所以如果用純理性的視角去看待這種民族主義激情，還是缺了一環，我想這可能更接近人類的生理本質，也就是說人類似乎對自己或者自己祖先的出生地有著超乎尋常的偏愛和重視。

第二件打口水仗的事更讓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政治立場差距是極大的。我在疫情觀察系列裏面專門寫到了觀念的撕裂，我當時的結論是這樣的：年齡不是顯著的變量，而社會身份才是。這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留學生，或者說所謂的後浪，大部分是比較主旋律的，充滿了正能量，當然也有一部分年輕留學生有不同的立場，但是他不說，可能因為他們的未來事業發展都要依靠中國這麼一個大舞臺。

另外一批人則是三四十歲的訪問學者，他們多是像主任醫生、高校名教授、國企幹部這樣的人，可以說是功成名就的，這些人也是捐款捐物的熱心人。而經我觀察，他們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在公共話題上不發聲，他們有一個不約而同的基調，即少說多做，或者不爭論。真正吵的比較凶的，反而是來美國多年、已經安居樂業的美籍華人們，因為他們習慣了張嘴就說。所以不管是對於行政當局的表揚還是批判，他們都非常熱烈。

以上是我當時寫下的判斷，但事後看的話這麼分析還是太簡單了。政治立場的形成是極度複雜的，社會身份只是其中一部分。後來我想到，個人的教育程度、閱讀經驗、人生遭遇，都可能對他的政治立場形成極大的衝擊。只不過在我們東亞文化圈，包括日本、韓國，大家慣於小心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

為什麼大家會感受到今天的社會如此撕裂？那是因為這次的疫情是席捲全世界的，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方方面面，誰都沒有辦法逃脫，於是就變成了持久熱度的公共話題，而大家的政治立場、價值觀都通過自己的言論表露無疑。但社會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公共討論習

慣，你如果在頭條或者微博上有過公共發言的經歷，就會對這個氛圍有所瞭解。

總體上，我們要感謝這次的觀念撕裂，畢竟大家不管是交友、婚姻還是工作，都希望跟三觀一致的人在一起。所以每個人的觀念通過這種大規模的公共事件表露出來，也不是壞事，所謂日久見人心，反正早晚是要表露出來的。另外我們也要習慣這樣的觀念撕裂，畢竟大家還共同生活在這樣的國度、這樣的地球。“君子和而不同”，大家最終會認識到想要去改變另一個人的想法和觀念，難於登天，你覺得理所應當的常識，對方可能覺得荒謬至極，反之亦然。

在有的社會，**protesting** 就是愛國，馬丁·路德金也說過，一個愛國者必須時刻準備保衛好自己的國家，就是要去街頭去抗議，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就犯了同謀罪，所以大家會看到在許多西方社會的街頭，因為這種理念分歧而走上街頭抗議的民眾很多，所以大家會感覺到亂糟糟的。

但是在另外一些社會，你沒有這種選項，你能做什麼？你只能歲月靜好，或者說潤物細無聲。從每一個身邊的點點滴滴來做起，來促進進步。也就是說，對於跟你觀念不一致的他者，你可以選擇去罵他，也可以選擇跟他理性討論，還可以選擇無視。每一樣選擇都有它的後果，對社會有不一樣的後果，對於你個人來講，也有的不一樣的結果。你罵人了，你可能心情不好，你跟人討論了，你有可能覺得在對牛彈琴，你無視了，可能事後會發現我是不是還是應該參與這種公共討論。**所以每個人都要承擔自己選擇的結果。**

■ 政治形勢和經濟脫鉤

聊到第二塊，叫做政治形勢和經濟脫鉤。我今年 2 月份提出了一個判斷，說這次疫情將會是對全球所有主要政府的一次大考，最後勝出的一定是國家能力最強大的少數國家，其他大多數國家在這次疫情裏是沒辦法交出滿意答卷的，最終可能會引發這些國家的民眾的不滿和政局的動盪。

在能交出滿意答卷的國家裏，我當時猜說中國、韓國、美國這幾個國家是沒什麼問題的。但是過了 4 個月，事後看這個判斷並不準確，很顯然美國現在沒有交出一個滿意的答卷。6 月初的時候，弗朗西斯·福山有一篇最新的文章，也指出了應對大流行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領導力，這三個都有的話，表現就會不錯，這三個都一般，比如說社會兩極分化或者領導不善的話，那麼表現就會令人絕望。他同樣也表揚了中國的表現，然後指出美國的反應笨拙至極，當然更多是在指責特朗普政府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糟糕，我們作為局外人，其實更多時候也不要真的是按照美國國內批評者的口徑來理解。因為就像五角大樓，你如果讓他去搞軍事推演，他肯定會把對手說的很強大，但實際上這只是內部博弈的一個常見技巧，正因此，美國國內的批評聲音才會非常響亮。

所以這一次疫情轉移到美國之後，全世界的輿論關注也都轉移到美國，聚光燈紛紛打過來後，美國政府在應對疫情上的陰暗面是暴露無遺的，

罵得最凶的像紐約時報寫的評論文章，就點名說特朗普還有人性嗎，這種文章迅速傳遍了中文的社交網絡。

其實，很多觀察者會發現美國最不缺的就是這種評論文章，甚至我可以這麼說，他罵的還不夠凶、還不夠狠、還不夠深入靈魂，如果真的深入靈魂，那麼他們的政府表現可能還是會有所改善的，但是目前看也就這麼回事，像這次的 **BLM** 運動，反而有可能更加觸及靈魂。

回到政治跟經濟本質上講，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化已經到了進退兩難的十字路口，只不過這次疫情讓這種進退兩難更加雪上加霜。

4 月份的時候我總結了一下，在政治方面，就像歐洲黑死病死去的多數是窮人一樣，這次受衝擊最大的一定是貧困國家和失敗國家，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有媒體關注，但其實又很慘。這幾個世界強國雖然比較難受，但最後一定是贏家，而且由於各個國家都需要調集更多的資源用於國內的救助和恢復，所以對於國際合作中需要自己投入的部分也許會心不在焉。“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可能大行其道，民族國家/主權國家的概念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會被強化，“民族主義”會更加有市場，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經濟方面，我 4 月份是這麼寫的，國際供應鏈會更加冗餘，而不是像之前那樣最重效率。冗餘是低效率的，但是相對更安全。大型跨國資本會非常謹慎地不再將關鍵部件放在單一國家和地區進行生產，從而防範類似疫情的再次衝擊。“比較優勢”理論、跨國分工協作將遭遇交易摩擦成本以及信任感的巨大挑戰。

總體上，我們會走向一個更加割裂的、更加民族主義的世界。如果有人把這個方向定義成脫鉤也未嘗不可，但是脫鉤並不代表著完全老死不相往來，而是漸行漸遠，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這個方向是已經註定的，無非是個人和各個國家怎麼來應對而已。

■ 後全球化時代的生活

最後我想聊一下後全球化時代的生活，所謂後全球化時代，其實大家並不陌生，因為所謂的美好的全球化時代本身就是曇花一現，也就三四十年。

上圖是一個歷史學家叫丹尼爾·西羅（Daniel Chirot），他寫了一本新書叫做《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他說，縱觀歷史人類社會，只要遇到這種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基本上每一次的溫和解決方案，總是會被更加激進的意識形態所取代，不管是法國大革命還是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總有溫和派，但是溫和派最後都被擠到邊緣上去了。激進的聲音會更容易讓人聽到。

丹尼爾·西羅 1942 年生於歐洲，小時候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2 月份我向他請教的時候，他說你如果站在 1940 年的歐洲，你會發現 1945 年的盟軍勝利是多麼的偶然，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後來走向一個比較和平美好的結局，其實是蠻偶然的一個事情。所以對於現在這個世界，他並不樂觀。

他說，我反正年紀大了，也不需要操這些心了。但對你們來說，你們可能要很嚴肅地面對一個比以前更糟糕的世界，就是這麼一個現狀。

我們應該怎麼做？過去 30 年是人類歷史上偶然得到的幸福，而凜冬將至，是普通民眾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換句話說這個方向是註定的，不幸中的萬幸，是人類反正都習慣了。要知道，人類是一個非常有韌性而且健忘的物種，天生就是為了應對不幸而存在的，中古年代或者工業革命之前，人類都過得很慘，只不過大家都習慣了。所以未來假設再來一次所謂“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人們適應起來也許比想像得還要快。

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所以大家面對這種不幸，坦然就好，習慣就好，改變自己能改變的東西，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東西。

說到生活方式，在疫情觀察的最後一篇，我琢磨了一下，結論是我似乎並不認為疫情過後，人類的生活方式會發生多大的劇烈變化，不同的人類社會、不同的國家，依舊會延續著過往的慣性繼續滑行向前。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經驗和歷史告訴我們，各個民族和政府從來沒有在歷史中學到過什麼，也從來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來運行過。

既然對於未來已經有了比較悲觀的判斷，我們作為個人反而可以淡定下來。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從每一個涉及到自己的事件來著手，來思考自己的權利，思考自己的**責任**。舉個例子，比如既然我們討論的是一整個時代，而不是短期應急的幾周或幾個月，那麼對一些問題的思考就更應該從長遠來著手，從本質上來作業。比如健康碼作為防禦工具，它能查詢到各種軌跡，非常好用，在最緊急的時候，大家對它的使用是一邊倒的贊同，但是在疫情常態化以後，大家是否還願意接受這麼一個嚴密管理、侵佔自己部分隱私的東西？可能這就又重新變成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了。

從公共討論到實際政策、決策的影響路徑，總體上看仍是比較模糊的，如果大家需要更深層次思考的話，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這樣一個機制問題。我相信大家到最後也會發現，具體問題，討論到最後還是終極問題。

聶輝華：我們怎樣在一個風險社會裏做出最優決策？

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來自南都觀察和思想潮舉辦的觀潮沙龍“後疫情時代，如何重啟經濟生活”中的發言，20200620

從今年開始，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不僅僅是因為疫情，對中國來說，第一，持續的嚴重的中美貿易摩擦，第二，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日益惡劣。

就算疫情已經過去，中國也不太可能回到過去了。那麼在這樣一個的世界裏，你怎麼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呢？

一直以來，大家對後疫情時代或者疫情本身做了很多討論，但是對一些深層次的思考是比較缺乏的。我今天講的叫做“大白鯊經濟學”，我想提出一個思考，那就是關於後疫情時代，我們怎麼在一個風險社會裏做出最優決策。世界已經發生改變了，我們的決策規則也要改變，如果墨守成規的話，我們可能會犯很多錯誤。

首先給大家講一個例子，大家可能聽說過“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原本是一個英國的牧師，當時根據他的觀察，人口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但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資源是按照算術級增長的，即人口的增加速度遠遠超過了我們生存所需資源的增加速度。這導致世界上資源不夠，於是會通過某種方式使一些人口被消滅掉，比如說大規模的疾病、戰爭、地震自然災害等等。總而言之，人口的發展速度不能超過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這個理論在當時是正確的，但現在看非常錯誤。

因為馬爾薩斯陷阱的基本假設建立在農業經濟時代，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技術進步，也沒有快速的生產力變化，所以人口才受到嚴重限制。縱觀整個世界經濟史，假設人類社會上只有一件事值得紀念，那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前，人的技術增長極為緩慢，還導致了東西方的大分流。所以在工業革命時代，人口增長不用受那麼大的限制。

我舉這個例子是說，如果我們把常態式的一些決策規則運用到非常大的世界裏，我們很可能會犯錯誤。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什麼是常態事件，什麼是非常態事件。我們大多數時候經歷的世界可以稱為常態，它的基本特徵是平穩運行、緩慢變化、沒有什麼巨大的外部衝擊。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照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來做決策。比方說你有穩定的偏好、長遠的預期，你可以做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的規劃，你可以做出非常理性的決策。你的目標一個是最大化效益，一個是最大化利潤。在常態中，世界像一個平靜的海洋，風平浪靜。

但我認為，從今年開始，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不僅僅是因為疫情，對中國來說，第一，持續的嚴重的中美貿易摩擦，第二，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日益惡劣。就算疫情已經過去，中國也不太可能回到過去了。我們現在相當於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雖然在總的歷史上尺度並不長，但是它帶來的影響非常大。在這樣一個動盪的不安的充滿風險的社會裏，你的偏好是不穩定的，可能會經常改變目標。關鍵是你不會再做長遠的決策，必須看中短期，幾乎所有的人都會選擇風險規避，甚至有可能會做出一些在主流經濟學看來是非理性的行為。

在這樣一個非常態的世界裏，有三個關鍵詞，第一是“黑天鵝”，第二是“灰犀牛”，第三是“大白鯊”。所謂的“黑天鵝”就是說這種事件非常罕見，破壞力很強，概率很低。“灰犀牛”是大概率會發生，但現在不會發生，比方說地球變暖、環境污染，或者珍稀動物的逐漸瀕臨滅絕。

我今天要講的是第三種，“大白鯊”。大家想像一下，在一片平靜的海洋裏有一隻大白鯊，它一直在這裏，但是你不知道它在海洋的哪個地方。你現在要做決策，比如要不要下海捕魚？如果不去捕魚，你就可能餓死；但如果下海捕魚，輕者會受傷，重者會被咬死。請問你現在怎麼辦？這個例子有點像是我們現在的世界，我們要做很多決策，但是決策本身就是一種風險，你不做決策肯定是不行的。沒有“大白鯊”是一個世界，有了“大白鯊”是另外一個世界。

這跟“黑天鵝”不一樣，“黑天鵝”是根本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來，所以沒有辦法做準備。也不是“灰犀牛”，“灰犀牛”是知道這個事情會發生，只是它現在不會發生，所以也可以不慌不忙地生活。但是“大白鯊”事件不是這樣，你知道它隨時可能發生，可是又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發生，也不知道它以什麼方式發生。那麼在這樣一個的世界裏，你怎麼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呢？

所以我們很多方面要拋棄過去經濟學的一些理念。我接下來要講幾個法則。

第一個法則是確保生存第一，而不是利潤第一。經濟學告訴你，如果你是個生產者，你追求最大化利潤，如果你是個消費者，你追求最大化效用，但是我現在告訴你，在一個非常的世界裏，生存是第一。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你是一個企業家，你要買股票，一個股票是高風險高收益的，另一個股票是低風險低收益的，你會買哪個？在常態世界這很簡單，期望報酬的話肯定是選高風險項目。但如果一個非常態的世界裏，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你選了低風險項目，你至少能保證自己活下去。所以這個時候決策原則不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生存第一。這在博弈論裏叫做“最大最小”原則，意思是說做決策不是選哪個收益最大，而是選在所有可能損失的情況下，哪個成本最小。這就有點類似於中國古代講的，“兩害相權取其輕”。

第二個法則是永遠都要有“備胎”，而不是孤注一擲。這個話跟傳統理論也不一樣，因為傳統理論一定會告訴你，買股票的時候應該“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學術研究表明，幾乎 70% 的多元化的並購都是失敗的，應該在某一個領域做深做大做強。但如果一個非常態的世界裏，這樣做可能就完蛋了。

舉個例子，汽車行業因為疫情損失慘重。在這種情況下，比亞迪跨界進入口罩市場，現在據說日產量高達 500 萬個，已經占全國口罩生產量的 1/4。這是一家生產電動汽車的企業，居然轉型成為最大的口罩生產企業，而且拿到了美國加州 10 億美元的訂單。我覺得不管這次能不能賺大錢，至少它能夠挺過去。所以大家發現，如果遵從過去的觀念是很危險的。在一個非常態的世界裏，有的時候改換賽道，比在原來的賽道上成為冠軍更加重要，因為原來的賽道盡頭說不定就是萬丈深淵，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教訓。

第三個法則是掌握核心技術，而不是完全分工合作。如果大家瞭解國際貿易，就會知道在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理論。比如說中國適合生產襯衫，因為中國的勞動力便宜，美國適合生產飛機，因為美國的資本技術發達，所以中國拿襯衫去換美國的飛機沒有問題。但如果你在生活中這麼幹很可能陷入困境。

例如在疫情期間，據說美國奶農每天要倒掉 1400 萬公升的牛奶，這是巨大的浪費。過去我們在中小學的教科書裏都寫過，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資本家要把牛奶倒掉，人為製造短缺，以便恢復的時候還能夠把牛奶以高價賣出去。但現在不是這樣，現在倒牛奶不是因為沒有需求，而是因為中間的供應鏈太長，與其花巨大的代價把東西送到消費者門口，還不如自己低成本倒掉，這就是分工導致的巨大代價。

過去我們認為分工是很好的，但現在發現不是這樣，這樣的話可能很危險。對比鮮明的是，中國有些企業一開始就搞上下游一體化，供應鏈整合，比如說現代牧業、伊利股份。這種情況下，他們反而能夠挺過這一關。這就是又一個相反的案例。

第四個法則是更加重視短期，而不是重視長遠。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所有人的預期都被擾亂了，不要試圖再想做一個非常長遠的打算。在一個常態世界裏，你可以做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規劃。但是在一個非常態的世界裏，我覺得人們不應該想這麼長遠，你應該想的是三五年內你應該幹什麼。

第五個法則是少借貸多儲蓄，而不是“貼現未來”。經濟學裏面有個假設叫做永久收入假說，如果你知道你未來的收入會增加，那麼你可以現在就花以後的錢，這樣的話你現在就可以提高你的消費。但是在非常態的世界裏不能這麼幹，因為未來隨時可能會斷裂，你根本不知道未來的現金流能支撐多久，未來的預期是不穩定的，這個時候借錢消費、提前消費、透支未來就是很危險的。

第六個法則，如果經濟是平穩的，一般來說，競爭會使得資源實現優化配置，找到最優的價格就等於把所有的信息都掌握了。但是在一個不充分的世界裏，價格不再是唯一有用的信息，甚至價格本身是擾亂決策的信息。所以不能只看價格，要自己去花很多時間去分析信息，每一個人的決策所需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換句話說，現在信息高度不對稱，需要小心決策。

第七個法則是儘量瞄準剛需。大家可能聽說過“長尾理論”，比如你賣書，中國有 3000 個縣，哪怕一個縣有 1 個人買你的書，那麼賣出 3000 本書你也能收回成本。但是在非常態的世界裏，大家要壓縮支出。如果你生產的還是小眾產品，試圖借助長尾理論，覺得自己通過互聯網能把全國的需求集聚起來從而收回成本，這是很危險的，這就要明確到你業務的定位。

最重要的是，哪怕疫情過去了，我仍然覺得未來會充滿各種變數，我們要直面變化，應對更大的不確定性，要學會在更大的背景下怎麼做出決策。

對話：身處更加動盪的疫後世界，我們如何生活？

南都觀察：有人擔心，疫情一旦復發，我們就回到嚴防死守的狀態，經濟恢復是不是會更加困難？現在國際上出現了兩種應對方式，一種是逐漸開放、恢復，讓病毒慢慢流感化；另一種是比較嚴格的防控隔離、減少活動，整個社會維持在一種相對比較低功能的運轉狀態。對於非常態的疫情防控和常態的經濟生活之間的這種平衡，兩位老師有什麼看法嗎？

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我覺得這是中央要做決策的問題。

我不贊成一刀切的思路，某個地區只要發生一起疫情，就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這種方法有點過於苛刻，也不符合現實的要求。我更贊成的方式是應該有個底線，賦予一定的權重。防疫的目的還是要讓大家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不能更好的生活，你防疫又是為了什麼呢？

我的建議很簡單，實行配額制。比方說某個地方可以有一定的概率發生一定的疫情，並不是說要絕對的嚴防死守、把它清零。

根據我之前的研究，中國通過“配額制”其實能夠有效地控制礦難，疫情防護也應該用這種思路。只要它在逐漸下降，或者只要它在一定範圍內逐漸遞減，我覺得就沒有必要追究責任。這樣會導致官員沒有安全感，他們一定採取懶政、封鎖或者搞形式主義。要平衡這兩者不那麼容易。這是我的個人建議，當然好多人可能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孫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疫情觀察》系列作者）：總體上我不擔心，因為本質上講這是一個國家能力的問題，而我們這個國家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這幾個月下來，不管是行政部門還是經濟主體，心裏都清楚這種一刀切的模式絕對是不可持續的。更加靈活的去應對才是唯一可行的路，即用時間換空間，熨平爆發的曲線，減少醫療部門的集中壓力。

我記得幾個月之前，歐洲方案還受到了很大的批評。但是經過摸索下來，全世界可能會形成這樣一個共識，不會有人說是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歸零。只不過具體強度有多強，現在也還在博弈中，大家在等待病毒自己在向毒性更弱的方向變異，等待更加有效的疫苗和療法出現。只不過有的國家和有的社會，他實在是沒有能力來實現這一點，叫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我們是有能力來實現的，所以總體上我不擔心這個事。

南都觀察：前面提到，中小企業對我們經濟民生影響非常大，在疫情中遭受重創。現在我們看到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了一些優惠措施，比如說稅費減免，財政補貼，但一些地方政府自己財政上也很不寬裕。我們看到美國政府之前有很多直接的資金補貼，能不能請兩位老師稍微介紹一下不同扶持政策的背景和效果？而國內的這類政策落實能否順暢？

聶輝華：中美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因為美國的儲蓄率很低，而中國人的儲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需要發錢，但是中國最底層的本來就沒有儲蓄的人可能需要發現金，因為他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關於消費券和錢哪個好，大家有爭議。簡單說，花錢的好處是直接拉動消費，缺點是你沒法引導他，你發錢他又存起來，你怎麼辦？發消費券的好處就是他一定會消費掉，因為消費券不能存下來。但是消費券的弱點是會誤導或者說錯誤的配置資源，可能涉及到尋租和腐敗問題。所以各有利弊。這方面沒有什麼標準答案，只是說根據不同的情況來做決策。

究竟中國的企業怎麼救，我也收集過很多地方的政策，很難說有一個簡單的原則。有些中小企業，稅收優惠其實沒有用，因為沒有營業就不用交稅了。所以很多地方說要免稅，其實沒有多大意義，沒有業務，免稅就沒有用。

發補貼也不現實，企業太多，選擇很麻煩。另外本來財政收入就主要來自於稅收，如果稅收少了，政府的錢又從哪里來呢？這也是一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好解決的。

其實更主要的應該是放開管制，過去不讓人幹的，為了經濟發展應該允許，比如說地攤經濟。擺地攤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救急而不救窮。通過減稅和補貼來救助中小企業，短期都不現實。

但在這個過程中，要考慮其他的相關問題，比方說你放鬆管制了，如果出了問題，是不是又要問責？很多時候上面總是希望說“既要又要還要”，但是你到了基層你不能這麼說，這麼說讓基層無所適從。為什麼強調說高層要有定力，要有智慧，你要給基層的政府一個清晰的目標指向，知道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要有一個清晰的排序，這樣的話我們在政策實施的時候能夠更精准。

孫超：發錢這個問題，我們之前也有過一些討論，後來南都觀察上唐麗霞老師寫了一篇叫《發達國家為什麼喜歡直接給老百姓發錢？》，這篇寫得特別好，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不同國家有不一樣的選擇。發達國家有非常完善的數據，雖然有一些紕漏，但是總體上講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掌握的要細得多。這是這種政策的一個基礎。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大部分社會成員對於未來的生活保障和確定性依賴於個體的積累。這一次應對疫情的這種財政政策主要是應急性的，所以發展中國家大多直接提供服務，或者說發消費券來應對這麼一個問題。

我認為消費券有三個維度可以改進，一個是從政府的維度上講，更好的券應該是讓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更高；第二，從商家的維度，它應該是能穩住自家收入的券，這可能是要有一系列的措施來配套；第三個是從消費者的維度，應該更好、更公平。

公平有幾個維度，一個是針對貧困群體的公平，最窮的人還是應該給他發點現金，因為最窮的人哪怕是在中國這種高儲蓄率的格局下，還是沒有儲蓄，給他們發點錢，其實財政上沒有什麼壓力的。我們這種網格化的管理，應該用在社會福利上。

第二個是針對技術弱勢群體的公平，很多中老年人連電子支付的技術都不懂，電子券把他們漏掉了。從技術角度上講，做好區分好，要看政府的管理有沒有細化到這個步驟。國家能力足夠強，要把這麼強的能力用到細緻的一些地方。

南都觀察：總理在今年兩會答記者問上說，中國有 6 億人口月收入僅 1000 元，這說明我們其實國家低收入人口數量還是非常龐大的，他們如果得不到保障，對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另外，美國最近黑人抗議的問題其實跟疫情帶來的一些經濟壓力也有關係，我們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參考來理解中國面臨的一些民生保障的問題。

聶輝華：首先要解釋一下，總理提的 6 億人是包括了很多本來就沒有收入的人，比方說老人和小孩。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太悲觀。短期內我不認為有什麼特別好的辦法，我還是主張政府應該稍微放鬆管制，允許靈活就業。

其實剛才孫超老師提到，中國的非正規就業隊伍非常龐大，只是它沒有進入正規統計。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維持生活，是因為他靠各種靈活就業，但現在疫情把很多靈活就業給卡死了。舉例來說，北京不讓外人進小區，看上去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影響的不是在小區裏生活的人的生存，是在小區外的那些非正規就業的人的生存。比方說清潔工、家政阿姨，他們都不能進小區了，這些人的生存就受到更大的威脅。所以我覺得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採取那種這種太僵化的管理方式。一個地方只有能夠做到精準施策，才能證明是個治理能力很強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逐漸放開非正規就業。中國人有個非常好的品德，吃苦耐勞，所以你只要大凡有一條路可走，他都不會走上絕路，這是中國過去幾十年能夠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如果不能創造就業，也不要阻礙就業。

其實民間有很多的路，因為大家的需求是五花八門的。而且現在有網絡，可以及時的找到需求，可以及時找到供給。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悲觀，只要政府能夠放開一條活路，允許靈活就業，就業不是特別難的問題。只要有就業，那麼托底的問題就好辦多了。我覺得我沒有孫超老師那麼樂觀，我們可能沒法借助大數據的方式來精準的找到哪些人需要救助。這個時候發錢的話一是壓力太大，第二是如果發錯了對象，可能導致了一些浪費或者是尋租的問題。

南都觀察：我們從就業民生的問題談到了一個精細的社會治理的問題，孫超老師有什麼回應？

孫超：短期來看，保障社會底層這個事，我覺得我們國家總體上做得還可以。本質上這是一個轉移支付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切蛋糕”的問題。雖然我們這個社會切蛋糕更多是自上而下來的，從公共討論到實際政策決策路徑比較模糊，但是從結果上看，底層老百姓的日子過得還行。

在極端情況下，我們還有一個龐大的國有經濟部門，有非常大的彈性吸納就業，只不過現在還沒有到那麼緊急的地步。短期看社會底層到沒有到特別著急的時候。但是中期看，我們要共同珍惜為弱勢群體發聲的輿論空間，弱勢群體要發出聲音能讓社會看到，才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體系來為他實行救助。如果沒有這個空間的話，可能悄無聲息的就沒了。我們網絡輿論空間還可以，我覺得這是這是值得珍惜的。

從長遠看，肯定還是要進一步的來增進民眾權利，推進更加有制度保障的這種社會福利體系。這也是一種社會公益。剛才聊到美國“BLM”運動，不要覺得是隔岸觀火，可以多思考說，我們國家的這一部分弱勢群體，不管是貧困的還是少數群體，甚至性少數團體的聲音有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為只有發出聲音，只有讓更多人關注，才会有更多的社會資源過來，才會防止落入到更加弱勢的這樣一個地位。所以我想從長遠看，還是要增進大家的這樣一個權利意識。

南都觀察：疫情期間，餐飲娛樂等線下服務業受影響非常大，但是也有一些像在線教育這樣的行業，甚至網紅經濟，得到特別的發展機會。兩位老師對各種不同行業受影響的情況有沒有什麼觀察？

聶輝華：我覺得首先總體上蛋糕肯定是變小了，大家要正視這一點。通過數字化轉型很多人成功了，那只是少數人成功，你看到一堆人成功的同時，有更多人其實是失敗的，這個事實證實蛋糕在變小，但是在變化的同時，分蛋糕的方式發生了變化，肯定會讓一些剛需的行業得到發展。

另外就是數字化行業，比如說像那種提供 AI 或者提供在線的交流工具的賺了很多的錢。但我覺得這終歸不是一個常態，因為中國的結構決定了大部分行業它是沒有辦法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數字化轉型不能過於期待。

有一句話叫做沒有所謂的夕陽產業，只有所謂的夕陽企業，意思就是說其實每一個行業都有機會，只是你有沒有抓住。我還是相信就是說只要大家開動腦筋，在很多方面他都能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關鍵在於政府要放開，讓大家自己去尋找機會，這樣讓每一個人都能變成企業家。

如果政府要去指點，或者專家規劃出一個行業來，我覺得是不對的。越是經濟下行，資金有限，財政緊張的時候，政府越是不輕易做什麼規劃。很多人總是想這個東西重要，我要重視，但你在重視一個行業的同時，相對其他行業就會被歧視，很多人沒有預料到這一點。我們要相信

明天的智慧，要相信大家的創造力，少管制多服務少規劃，少搞產業政策。

孫超：我很贊同聶輝華老師說的，我覺得經濟集中度一定會進一步提升，強者恒強。因為大船才扛得住風浪。所以未來這些資源還會向進一步向這些互聯網巨頭集中。這個趨勢本來就在，只不過疫情之後更加明顯。從本質上講，這些互聯網巨頭的經營效率，激勵機制都遠遠勝於其他的這些競爭對手，不做大是不可能的。

相應的政策調整，有一個從公共討論到實際政策決策的影響的路徑，那麼我們的社會決策機制應該是怎麼樣的？有沒有能夠反映相關的行業從業者的聲音？一定要有一個成型的渠道來把具體的這些少則幾十萬多則成百上千萬的這種從業人員的利益，反映上去，落實到決策上。

這可能是一個治本之道。就像聶輝華老師說的，我們不是神，政府部門也不是神，沒有人知道具體的行業，現在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可能有的行業只有幾萬個人，非常小的行業，但它需要有代表，需要有路徑來參與到實際的政策決策中去，這才是治本之道。

孫超：我想請教聶輝華老師。中國存在“信息繭房”的問題，你覺得在中國這麼一個輿論環境下，有沒有什麼辦法能讓不同的立場的人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信息繭房理論認為，人們對信息是有選擇性的接觸、吸收和記憶的，只有通過檢測的信息才能夠通過繭子進入人們的接收範圍，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

聶輝華：孫超老師這個問題不是我的專業，但是我覺得很重要。我其實比較悲觀，我覺得沒什麼特別好的辦法，如果說有的話，最重要的一條是大學一定要專門設一門課叫邏輯學。

我看過一篇文章，裏面提到我們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不要批判人家動機，因為你沒法驗證人家的動機，更不要批評人家的智商。我們只接受兩種批判，第一邏輯批判；第二個經驗批判。如果大家都按照這兩個原則，很多事情其實好辦，沒有那麼大的爭議，問題就在於我們先有立場，這說白了其實都是不講邏輯，而且這個不講邏輯，跟一個人受教育程度沒有太大關係。

如果一開始我們就學會了邏輯學，就會喜歡批判和討論，在中國我覺得不太容易做到，這在所謂的“底線思維”情況下是很難的。但就算學校沒有教，我們作為受過教育的成年人，都應該懂點邏輯學的知識，懂點科學的知識，這個很重要。一定要開放，在做出自己的判斷之前，一定要能夠聽得進別人的觀點，因為只有大家開放，把自己放空，才有可能真的能夠聽到真相，知道了真相，才能做出政策的決策。

現在我們很多人是一開始就把自己封閉起來，這是不對的，作為一個大國公民，我們應該有一定的定力，有一定的度量，要能容納不同的見解，這是中國要想成為世界大國的必經的一個階段。如果我們不能做好公民教育的準備，我們就很難成為真正的大國。

南都觀察：我們好像面臨著一個跟此前 40 年不同的時代。以前開放交流，互通互融，然後增進瞭解、共同發展，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人類趨勢。但是現在各國各地都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保守隔離，甚至封閉孤立這樣的傾向。我們作為個人怎麼樣理解這個時代，要怎麼樣在這樣的時代生活？

聶輝華：這個問題基本上已經提高到了哲學的層次，在一個普遍失德的社會裏，我們如何過上一個德性的生活。第一我覺得首先我們要直面現實，世界已經發生變化，我們要審時度勢，我們不能老想著還能回到過去的樣子。

第二個是還是要尋找生機，是因為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人們總是會有新的發現，人們總是會活出自己的價值來。

第三個是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開放的心態。我自己深有感受，我們以前想一件事情總是想到這個事情能不能掙到錢，但現在很多人想的是我怎麼能夠活得更明白，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幸福。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不再是謀生，不是為了生存而艱苦奮鬥，而想到我怎麼活成一個健全的人，我怎麼成為一個世界公民。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已經到了有準備的時候，不能像我們那個時候一樣，每件事都想著怎麼掙錢，而是想我怎麼能夠跟世界和平共處，去實踐、去觀察，跟不同人交流，這是不可避免的。

到了國外怎麼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怎麼跟不同文明的人一起生活，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即便在國內，我們怎麼跟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和平共處，這也是一個挑戰。這說明我們在物質上這些年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在公民素質上，在社會心態上可能沒有太大的進步。這是令人感到遺憾和可惜的一點。很多人沒有想辦法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合格的世界公民。

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要融入世界就很難，我不希望中國再走回頭路。2001 年中國加入 WTO，這是幾十年中國最大的制度變革，因為中國融入到世界體系，所以我們才取得這些文明成果。我們千萬不能以為我們可以關起門來搞一套，脫離世界，這是不對的，不應該有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我們怎麼能夠活出一個健全的人格，這當然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我期待年輕人，他們有比我們更好的物質基礎，更好的硬件，更好的技術手段，我覺得他們應該更容易實現這一點。

孫超：我認為第一是知足常樂。過去幾十年的好日子當然是過去了，但是跟世界大戰、冷戰這種來比還是強的。一方面是科技進步了，普通人能過上的日子比五六十年前都要好。另一方面很多價值觀經過翻來覆去的討論和實踐，慢慢真的深入人心了。不管是什麼地方，自由、平等、公平這些理念，沒有人說他不好，這些理念都已經共通了。那麼 20 世紀那種典型的集權主義已經很難捲土重來，沒有這種土壤；劍拔弩張的激烈衝突，我們目前還是看不到的。

所以總體上來講知足常樂還是幸福感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再不濟我們總歸是擁有“後浪”，我們還是擁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哪怕你只是在消費領域，哪怕你只是在部分領域，選擇的自由也值得珍惜。

第二我覺得還是要關心弱勢群體。從自己做起，更多關心弱勢群體，因為你不知道你哪天就變成弱勢群體。不管理念有什麼差異，總體上都共同的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還是命運共同體。更慷慨，更有同情心，更有效的這種轉移支付，更加公平的社會，總體上會讓我們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在過好自己的日子的同時，還是要力所能及的去關心別人。這就是孟子所說的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你自己還活不下去的時候，你也沒辦法，頂多上網少罵兩句。但是如果你過得還行，還活得下去的時候，我覺得還是要更加關注弱勢群體，至少要能讓人發聲。

我覺得就這兩條，面對更動盪的更糟糕的社會還是能過的。一個是知足常樂，在這個叫把灰暗的日子也過出彩色來。第二個是關心弱勢群體，這樣你自己成為弱勢的時候，那麼可能也會有其他的人來更加關心你。

南都觀察：有人說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相當於一場金融危機，也有人說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遠非一場金融危機可以比擬。因為金融危機是富人的危機，而新冠疫情其實主要影響的是底層人民的基本生計，其實是窮人的危機。請問兩位老師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聶輝華：首先我覺得任何一場危機都不會只是富人的危機，如果一個社會中富人都掙不到錢，過得不好，窮人一定過得更不好。任何一場危機都是財富的洗牌，在這裏倒黴的不只是富人，一定有窮人，所以我們不要用對立的觀點說，富人不好，窮人就會好，這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因為所有的企業、所有的活動都既有富人的參與，又有窮人的參與，大家只是分工不同。而且，窮人與富人之間你也很難劃出一個明顯的邊界。比如說在北京，你有一套房，聽上去像富人，但是一夜之間你可能就變成窮人了，這個是瞬間可以歸零的。

我個人覺得，這次疫情比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影響都大。金融危機就好比說你摔了一跤，爬起來了，後面的生活可能沒有太大問題，只要你康復了，它就會復原。但是這次疫情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樣。

首先，它可能導致供應鏈的重新佈局。現在你不管幹什麼都要有 **Plan B** 而不能只有 **Plan A**，換句話說，一定會導致很多國家重新佈置供應鏈，把一些重要的環節放在不同的國家，以分擔風險，而不會只放在某個國家。所以說這次危機它已經衝擊了國際經濟的金融秩序，過去沒有這樣的事情。

其次，在過去的金融危機中，如果幾個國家發生危險，大家會齊心協力共度難關。但是在疫情中我們出現了一些國家之間內鬥，地區之間內鬥的事情，比如搶醫療物資的問題，它破壞了過去的和諧關係，是因為大家發現在疫情中，當經濟下行的時候，地區之間、國家之間變成一種零

和博弈，包括人與人之間，這種零和博弈說白了就是要麼你多、要麼我多，不可能兩個人都變好，這就很麻煩了。而過去的金融危機，大家會一起想辦法渡過它，渡過之後大家都會好。疫情導致的撕裂感，可能在很長時間內都不太容易康復。

另外，金融危機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這次疫情導致的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文化問題，這就很麻煩。一般來說政治問題不好解決，經濟問題好解決，因為經濟問題說白了就是錢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凡是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最後，它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問題，就好比說國家之間，因為疫情問題，大家相互指責，或者相互甩鍋，導致了民眾的不信任，甚至切斷了科技和人文之間的交流，導致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我說句實話，比如中美之間，科技和金融的脫鉤一定會發生，我最擔心的是人文交流的脫鉤，這才是最麻煩的。我悲觀的認為，這次疫情導致的傷害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而且它波及的面太廣了，全世界大概有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基本上 90% 都受到了影響。世界上沒有哪一次金融危機會影響到這麼大的面。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情況，我們一定要分開來看，要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孫 超：總體上我覺得它首先是窮人的危機，然後一定會傳導到富人的危機。富人在生存機率和避免感染的概率上比窮人強太多了。不管是黑死病的時候，還是這一次，你有錢完全可以跑到一個小島上，自己躲著幾個月就不出來了。

但是後面窮人都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會有兩個傳導路徑傳過來。如果是在民主國家，有選票的國家，大家會用選票把凡是不照顧他們利益的領導人都選下去，也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崛起，民粹主義就是想像中的精英跟想像中的民眾之間的二元對立，他們會把這些精英都想像成壞人、糟糕的人，那麼民眾就是正義的，而我們正義的民眾要分配這些不正義的精英的財富。在選票國家，他會用選票的方式來分配，所以有很多中產階級或者更富有的階層會覺得，怎麼政府越搞越糟糕，怎麼老在分我的錢，但實際上他們沒有看到，確實是有民眾的呼聲來造就這個事情的。

而在威權國家也一樣會有再分配，因為任何一個政權國家都希望有穩定的政治格局。當底層金字塔的中下層受損的時候，一定會有各種形式的再分配，只不過分配的是誰的財富而已，是金字塔頂的 1% 的人，還是金字塔中間的 10% 的人，這其中會有差距，但一定會有蛋糕被切下來，這還是比較理想的情況，即從富人或者從中產階級到窮人的再分配。

那麼更糟糕的情況，在一些更邊緣的國家，一些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們名字的國家，有可能政府會倒臺，社會秩序會失控，會造成內亂或者戰爭，這個叫暴力再分配。對於這個國家的富人而言，暴力再分配是很糟糕的，還有這對於他們的鄰國，和整條產業鏈上的其他國家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負面衝擊，會影響到鄰國的富人和中產階級，因為社會秩序變差了，你需要給出更多的社會資源，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救助他們。

所以本質上講，全世界的人是一個繩子上的螞蚱。大家要更多去關心這些受損害的窮人，當他們還過得下去的時候，社會秩序受到的衝擊小。當他們實在過不下去，走上街頭的時候，你可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所以這是一個全世界的危機，只不過有時間先後或程度輕重的問題。

另外，我覺得這跟個人的努力關係不大，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或者說必然的過程，並不取決於政體，也不取決於個別人是怎麼想的。它本質上是一個自動的過程，有一種人之為人的感覺。總之，它一定會傳導過來，只是路徑不同。

南都觀察：中美關係急轉直下，而且全球產業鏈進一步移出中國的趨勢也有可能增強。如此情況下，請問兩位老師，中國國內的經濟恢復發展有什麼新的關鍵點？中國在國際經貿舞臺的位置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聶輝華：關於中美關係，我參加過幾次高層次的內部討論，總體上講，不管是美國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於中美關係都持比較悲觀的態度。

孫超老師之前談到說民主黨和共產黨沒有交集，其實他們是有交集的，他們唯一的交集就是在對付中國方面，他們完全異口同聲。我們很難想像，民主黨和共和黨在中國的事上高度一致，這說明他們不是一下子的頭腦發熱，有人說至少追溯到 2012 年左右，他們就開始了這樣一個逐漸地推動工作，所以我對中美關係的改善完全不抱任何希望。

但我覺得中國也不用過於悲觀，因為一個是中國市場足夠大；第二是中國經濟底子還不錯；第三，中國在一些高端技術方面已經掌握了一些優勢。所以我覺得中國下一步有可能會更多倚重日本還有歐洲國家，世界上有那麼多國家，國家之間，國家利益是最重要的，不會有的國家為了國家利益而跟中國刻意脫鉤。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區分一下，中美之間脫鉤可能是必然的，但是別的國家跟中國脫鉤，我覺得不一定。

比如日本的態度就很騎牆，他當然希望利用中美之間的衝突，但並不想那麼快站隊。很多國家本來不大，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對他們來說這是個機會。所以中國也要善於利用多國之間博弈的空間，爭取給自己帶來更多發展空間。

說白了，中美博弈是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問題。從時間上看，優勢在我們這邊，只要能熬過這一波，中國佔優勢的概率非常大。當然如果沒有熬過這一波，可能就會受到很大損失，不用太悲觀。說實話中國未來怎麼發展，也不是我們隨便可以說的。但是我覺得，第一，我們千萬不要因為中美關係鬧僵而關上開放的大門，這才是最糟糕的。美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全世界對中國關上大門，所以美國壓著別的國家，希望他們跟中國逐漸脫鉤，但是我相信其他國家會理性決策，不會隨便聽從美國這樣一個高壓政策，所以我們自己不能亂了陣腳。

第一要保持開放的態度；第二，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朋友；第三，我覺得中國人的潛力是無限的。只要中國能夠在很多方面適度放開，比方說開放思想市場，鼓勵更多的創新、更多的自由創造，放鬆一些管制。

憑藉中國這樣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的精神，我對中國的未來並不感到悲觀。但前提是我剛才說的，中國一定要進行變革，如果不變革的話，以過去的方式，以現在的狀態、現在的制度體系來應對美國的話，我們很可能會處於下風。但是如果中國願意改革，也許在危機中能發現新的機會，這是我的觀點。

孫 超：我再重複一下，國際供應鏈會變得更加冗餘，而不是像以前更關注效率。冗餘是低效的，但是安全的。也就是說，大的跨國資本會非常謹慎的不把關鍵部件放在單一的國家和地區生產，原來有一些東西只放在中國生產的，他會搬出去，或者在別的地方找個備份。但是反過來，有的東西原來也只在別的地方生產，他可能還會琢磨著要搬過來。最終考慮的因素是經濟效率和經濟成本，加上政策、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安全。

所以總體來講，我們在前面幾項上是有競爭優勢的，這麼好的勞動力，這麼好的配套，甚至一些招商引資的政策都還在，而且有這麼一個慣性在，這都是競爭優勢。只不過加上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方面還有冗餘性方面的考慮，會有一部分轉出去。這是必然要面臨的現實，我們能做的事也只能像剛才聶老師所說的，意識形態方面，看能不能儘量淡化一點，不要搞得針鋒相對，還有地緣政治上能否不要太過劍拔弩張。

如此資本在選擇的時候，自然會有自己的考慮，美蘇爭霸那種矛盾程度跟後來這種競爭合作的矛盾程度自然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內部會有一本賬來做計算。根本上，其實還是在於勞動力素質各方面的要素配套，自己內部的營商環境，所以這方面只要保持強有力的優勢，總體上不用太悲觀，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觀點。還是那句話，練好內功，不要瞎整，就這麼簡單。